

史學研究論文叢刊
中國歷史學會主編

彭明輝 撰

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思想與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
——中國思想與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

經古思想與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

中國思想與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

史學研究論文叢刊

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

基本定價四元四角

主編者 中國歷史學會

撰者 彭明輝

責任編輯 張樹怡

校對者 張曉寧

發行人 張連生

出版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臺北市10336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郵政劃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電話：(〇二)三一六一八

傳真：(〇二)三七一〇二七四

• 中華民國八十年九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本書能夠順利出版，要特別感謝業師閻沁恆教授的耳提面命，他曾不祇一次直言這個論題的爭議性及研究的種種困難，但在顛覆迭宕的撰寫過程中，仍給予最大的精神支持，以及生活上的照顧。我也要感謝戴玄之師的厚愛與縱容，使我勇於提出自己的見解。多年師弟情誼，玄之師實待我如子，春風化雨，永銘於心。可惜在本書出版之前，玄之師已然大去，相信他在天國看到本書的出版，也會感到欣慰的罷！這幾年求學、工作的歷程，種種轉折，林能士師如父如兄般地隨時指點迷津，使我勇於面對一切，並執著於史學之路，思想上的啓發，生活上的照應，惠我最多，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妻子翎君奔走於書房與廚房之間，最是辛苦，一面忙着自己的研究和工作，一面還要照顧我這個歷史學徒，委實不易。如今交出這本小書，希望不太令她失望。

本書修訂完竣後，我仍繼續在史學園地裏摸索，下一個論題是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這並不是說古史辨運動的研究已經完成，而是希望自己能拓展研究的視野，冀期對現代中國史學的研究有所獻力。事實上，本書中的論點還有許多需要斟酌之處，但修訂亦不勝修訂，而且，我相信一本書的出版，正是它修訂的開始，尚祈海內外方家不吝賜正。

彭明輝謹識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於政大歷史研究所

目次

第一章 引論.....	一
第二章 儒學體系的疑古思想.....	一五
第一節 章實齋「六經皆史」與崔述「考信於六藝」的內在關連.....	一六
第二節 「託古改制」與「諸子創教」理論對六經歷史結構的破壞.....	三二
第三章 超越儒學的疑古思想.....	五二
第一節 古史辨運動形成的幾條線索.....	五三
第二節 「層累造成說」之提出.....	六五
第三節 經學與諸子學之互動關係.....	九二
第四章 民俗學研究與古史辨運動.....	一二八
第一節 胡適的方法論與白話小說研究.....	一三〇
第二節 孟姜女研究與「層累造成說」.....	一四九
第三節 從歌謠採集到《詩經》研究.....	一六九
第五章 疑古思想與現代史學的發展.....	二〇五

第一節 民族多元論與神話分化說·····	二〇七
第二節 史學與史料學的發展·····	二二二
第六章 結論·····	二四七
參考書目·····	二五四

第一章 引論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顧頡剛主編的《古史辨》第一冊問世，開啓現代史學的一個革命性運動。參與這場古史討論的學者（不論贊成或反對），幾乎涵蓋了當時的整個學術思想界。姑不論古史辨運動的成績如何，其引起的爭議，可說是空前未有的。

當然，任何一個思潮或運動的形成，都不是單一線索所能解釋，古史辨運動也是一樣。論析這個運動的形成背景，有幾個層面的意義必須面對：其一，由儒學「六經」所建構的中國古史，面臨空前未有的挑戰。事實上，植基於「六經」的歷史結構，是二千年來，有關中國古代歷史的惟一解釋。古史辨運動的第一個意義就是打破了儒學體系的藩籬，從此，古史研究可以不再在儒學體系所設定的跑道上慢跑，亦惟如此，古代史研究纔能邁向一個新的解釋。其二，疑古思想與五四時期反儒學運動之若合符節。事實上，二者之關係千絲萬縷，實難加以釐清。筆者個人所努力的，只是把古史辨運動放到五四的時代背景來加以考察，分析思想與時代的關連性。其三，五四時期「科學主義」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這當然牽涉到胡適所提倡的「科學方法」，及其所引進的杜威實驗主義。事實上，不管贊成或反對胡適的治學方法，他對古史辨運動及五四時期的學術思想界，所具有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其四，新文學運動及由此運動所引發的白話小說研究、歌謠採集運動、民俗研究、知識分子到民間去等等，都開拓了史料的更大範圍。

上述四個層面，在古史辨運動發展過程中，實乃缺一不可。在從事歷史研究時，吾人常有的迷思（Myth）就是：喜歡在歷史裏面找尋通則（General Principle）；而歷史惟一不變的通則可能就是「變」。因此，面對古史辨運動這樣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史學革命，史學工作者所可能解釋的，也止於：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學術思想氣候裏，有那樣的一群人，發生了那樣的事。所幸，歷史沒有如果，亦不會無中生有。我們不能假設如果沒有胡適引介杜威實驗主義，那麼古史辨運動將會發展成怎樣的面貌？或者，如果當時沒有歌謠採集及民俗研究的提倡，古史辨運動將會朝那個方向發展？我們所能做的，祇是把這個運動的各種線索條理分析，探討其形成的背景與影響。但必須注意的是，思想絕非單一或直線式的發展，個人如此，時代思潮亦然。當我們看到崔述「意在尊孔衛道，終至疑古惑經」時^①，便明白初發心和終點之間，往往有著很大的距離。胡適早年認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是科學的，終則不免寫「治學的方法與材料」，為他所提倡的科學方法加以解釋說明^②。同樣的，顧頡剛始於疑古，終而可信，也是頗耐人尋味的。但正因他太猛於疑古，使得他晚年能夠可信的材料又太少了。所以，產生疑古思想的背後驅力，往往各各不同，而其結果也像朱子所說的「理一分殊」。因此，在爬梳疑古思想的線索時，對於各人動機異同固不能忽略，而不同動機所造成的交集——疑古思想，纔更是討論的重心。

周予同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一文中，將現代中國史學分為四個派別：泥（信）古、疑古、考古與釋古。其中信古派因為對「六經」所建構的古史，抱持信而不疑的態度，難入於現代史學之林；釋古派依周予同的看法其實就是「史觀學派」，以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社會史論戰」中的陶希聖為代表；考古派的大將是羅振玉（雪堂）與王國維（觀堂），而使釋古派地位能與疑古、考古兩派鼎足而立的則是

「三堂」之一的郭沫若（鼎堂）。郭氏應用甲骨、金文爲基本材料寫成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是結合考古、信古兩派的新發展^③。

但在上述三個派別（去除無甚新義的信古派）中，考古派與疑古派雖爲「分殊」，其實卻是「理一」的。雖然考古派的王國維批評疑古派「乃并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於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於古史材料未嘗爲充分之處理」^④；往深一層看，疑古派可稱之爲「載記考證學派」或「文獻考證學派」；考古派則是「遺物考證學派」或「出土文物考證學派」；就史料鑑別來說，二者乃相輔相成，可統稱之爲「史料考證學派」。就民國史學發展而言，史料學派可說是成績斐然，雖然他們所成就的僅止於史料之考訂，不免有「證」而不「疏」的缺憾。但同樣的，史觀學派（非特指陶希聖而言，而係指以歷史唯物論爲主的歷史解釋）也有其「疏」而不「證」的危險。尤其在史觀的解釋上，常常會有一個材料兩面鋒的情形出現^⑤。顧頡剛本人也認爲他從事辨僞工作，是在爲古史研究奠立基石。他的考辨工作可以毋需依賴史觀學派，但他所考證出來的材料，卻是史觀派學者所必須加以參考的。顧頡剛說：

「我以爲各人有各人的道路可走，而我所走的路是審查書本上的史料，別方面的成績我也應略略知道，以備研究時的參考，我決不願阻擋別人走的路。……我的工作全部工作的應有的一部分，決沒有廢棄的道理；如果這一部分廢棄了，無論是研究古學或唯物史觀的，也必然感到不便。建築一所屋子，尚且應當有的人運磚，有的人畚土，有的人斲木，有的人砌牆，必須這樣幹了方可有成功的日子。

「^⑥

但民國以來的史學發展，史料派與史觀派卻常在兩極的對立之中，這對現代中國史學而言，可說是一極大

的傷害。余英時在「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中曾明確地指出這一點，他說：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先後曾出現過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響最大的則有兩派：第一派可稱之為史料學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為史學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稱之為史觀學派，乃以系統的觀點通釋中國史的全程為史學的主要任務。從理論上說，這兩派其實各自掌握了現代史學的一個層面：史料學是史學的下層基礎，而史觀則是上層結構。沒有基礎，史學無從開始；沒有建構，史學終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學與史觀根本是相輔相成，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但是在實踐中，中國現代的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由於各趨極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銳的對立。史料派鄙史觀為空中樓閣，而史觀學派則又譏史料為支離破碎，不識大體。」⑦

不幸的是，現代中國新史學就是在這種「離則兩傷」的狀態下發展的。這種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分途發展的結果，使得「下層材料」與「上層結構」之間找不到溝通的橋樑，不能說不是現代史學發展的悲劇。

但當我們以後來的先見之明論析民國史學時，是站在高處，以統觀全局的眼光來看現代新史學的發展。而對當時的學者們來說，卻是身在歷史的洪流之中而不自覺，亦難收綜觀之效。滔滔巨浪，令人目為之眩。所以，在進行討論之時，不能不顧及歷史現象與吾人今日理念之間的誤差。如果我們不過度苛求，由古史辨運動一脈發展下來的史料學派，在歷史研究範疇的努力仍是不容忽視的。尤其在鑑別史料、擴大史料範圍，以及史料學與史學研究之間的內在關連方面，古史辨運動都具有相當關鍵性的樞紐地位。

必須注意的是，所謂「史料學派」「史觀學派」並不是有系統的組織，亦非嚴格的學術團體，而是一種學術思想的取向。大體比較接近西方的「學派」(School)，而與我國傳統的「程朱學派」、「陸王學派

」等等有別。我國學術思想史上所謂「學派」，首重師門承傳，而「史料學派」「史觀學派」云云，則止於一種思想取向而非師承，就這一點來說，前者可以說是「家學」，後者則為一種「思潮」；因此，所謂「史料學派」「史觀學派」，殆泛指具有共同思想取向的研究工作者而言。而「疑古派」便是此類具有疑古思想的學者之統稱，基本上並不是很嚴格的。

自民國十五年《古史辨》第一冊問世以來，迄今已六十餘年，即距《古史辨》第七冊之出版（民國三十年），也已將近半世紀，截至目前為止，有關古史辨運動的研究著作並不算多。在外文方面，美國史家許乃德（Laurence A. Schneider）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是第一本出版的有關顧氏史學研究專書^⑧。此書主要係討論顧頡剛一生的學術成就，而非以古史辨運動為主要論題。其長處是掌握了顧氏一生各階段學術研究之變貌：由疑古、歷史地理，而審慎釋古的過程。但此書在討論顧頡剛與民俗運動時，太過強調民眾觀點，反而忽視了它與古史研究的血肉關連^⑨，這是筆者個人所不敢苟同的。德國的吳素樂（Ursula Richter-Chang）女士以《古史辨》為碩士論文，以顧頡剛為博士論文，其書尚未出版。吳素樂曾於一九八〇、八一年，兩度前往北平，對顧氏生平資料做過相當徹底的整理^⑩。在中文方面，王汎森先生於一九八七年五月出版《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是截至目前較為體大思精之作。此書主要著眼於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的因果關連^⑪，對清季今文家與古史辨運動之關係論述頗詳。其餘尚有一些單篇論文，率皆零星之作。其中童書業、楊向奎的論文，大體是站在批判古史辨派的立場而寫，並非純粹的學術研究。如童書業即指古史辨派「是美國實證主義傳到中國後的產物」^⑫；楊向奎則認為顧頡剛「走的是公羊學派的老路，並不是乾乾脆脆的古學家」^⑬，雖然後來在根據此

文修改而成的「論古史辨派」一文中，楊向奎轉而稍肯定古史辨運動的正面價值^④。而童、楊二氏都曾參與古史辨運動，兩人的論著亦為《古史辨》第七冊的重心，童書業且為該冊主編，學術環境對人的扭曲與傷害，由此可見一斑^⑤。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許冠三先生，於民國史學用力甚勤，十餘年間先後寫成論文八篇，於一九八六年出版《新史學九十年》^⑥，此書主要以民國史家的個別研究為重心，計分四章，篇名分別為「史學新義」、「考證學派」、「方法學派」、「史料學派」，其中「方法學派」討論胡適與顧頡剛之史學，「史料學派」討論傅斯年與陳寅恪之史學，此二章與古史辨運動有較密切之關係^⑦。許冠三生於「自序」中說明《新史學九十年》之作，「非惟察往，更重開來」，其宗旨在於「以歷史門徑敘各派新學術的發生、流變與興衰；以比較手段顯各家意旨的異同、深淺；以世界設準評各類義例的得失長短；以客觀態度考察新史學的大同，並測其未來走勢」^⑧。本書優點是把民國以來的史學家聚集一堂，論析其史學思想與方法之異同，有統觀全局之效，可以說是一本廣義的「中國現代史學史」。

所以，本書之作，與前述諸文與專書殆有所異，所詳所略，亦各不相同。本書旨在說明疑古思想在解脫儒學體系的歷史解釋之束縛後，其與現代史學發展的關連如何？進而梳理古史辨運動在現代史學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尤著重史料範圍的擴大，進而影響及歷史研究之質變。在討論的過程中，以《古史辨》七大冊為主要材料，分析疑古派在理論與實踐的合拍程度，究竟做到了多少。因此，本書並不縷述《古史辨》七大冊之所有內容，或此一運動在上古史研究有何具體的成績。換言之，也就是不打算清理《古史辨》考訂了那些史料的真偽，建構了那些中國上古史的新解釋等等；必須先說明的是，這不是一本全面檢討古史研究成績的專書，而是探討疑古思想在現代史學的發展上，曾經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以及古史辨運動

在現代史學的拓荒過程中，究竟有何貢獻？因此，個別的古史研究，古史文獻的考訂，古代史實的重建等等，都非本書重心。質言之，本書主要的著力點是把疑古思想放在史學史的脈絡中加以討論，期能於現代史學的研究有所獻替。

雖然因果律 (Law of Causality) 已是陳說舊論，但在歷史研究卻仍是其命維新的。在探討古史辨運動的思想淵源時，我們不能忽略了中國歷代都有著疑古思想的質素，若隱若現。雖然歷代的這些疑古思想並不一定對古史辨運動產生直接影響，但在《古史辨》七大冊中，卻也不時出現與其相關之討論。當然，並不是說歷代的疑古思想必然會引發像古史辨運動這樣大規模的疑古運動，古史辨運動也不祇是歷代疑古成績的總集合，而係有其嶄新的歷史意義。但我們仍不能忽略，在歷代的疑古思想中，可以找到與古史辨運動若何相關的蛛絲馬跡。中國歷代的疑古思想，大部分和「疑經」扯不開關係，其中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緣於「六經」為儒學體系建構中國古史的重要根本，也是儒學建構其道統與倫理的重要據點，因此，歷代的疑古思想便環繞在這個範域打轉。

疑古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論語·八佾》中所說的「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⑩。這種以文獻足徵與否為考信的態度，疑者存疑，信者存信，可以說是疑古思想的起源。而「疑古」另一面的意義正是「考信」。孟子對古史的態度，更直接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⑪。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春秋戰國之世，已頗有文獻不足之感，並且對文獻的可信性亦有所懷疑，難怪《荀子·正論》篇要說：

「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也。」^②到了韓非子更直接說「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③。

春秋戰國時期的顯學——儒與墨，對古史解釋的對立情況則更為嚴重，《墨子·公孟》篇說：

「墨子謂公孟子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④

儒墨相攻的內容，《韓非子·顯學》篇便明白指出兩家託古的不可信：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⑤成書稍後的《淮南子》，對託古風氣有精闢的見解，「修務」篇說：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闢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聽之，正領而誦之。」^⑥

降至漢代，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東漢經學風氣極盛時，還出現了一位疑古的急先鋒——王充。處在儒學氛圍如此濃厚的時代，《論衡》的疑古非聖，其勇氣令人不能不佩服。《論衡》書中的「書虛」、「語增」、「問孔」、「疾虛妄」諸篇，對儒學權威的挑戰及其疑古精神，在漢代的學術環境來說是相當突出的。「問孔」篇說：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聖賢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聖賢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⑦

「書虛」篇又說：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聖賢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

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②

王充不祇對文獻抱持相當懷疑的看法，他對聖賢之說也頗不相信，因此，對古史的某些傳說，當然也就大加撻伐了。「案書」篇說：

「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③

這類以諸說對比的方式，論析其爲不可信的方法，也是康有爲在《孔子改制考》一書所善用的；在古史辨運動時更廣爲顧頡剛等人所繼承。但最直接師承王充《論衡》的要算劉知幾。劉知幾《史通》一書中的「疑古」與「惑經」篇，對古史事與經書記載，抱持相當的懷疑。「疑古」篇說：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爲獨夫，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血流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④

關於堯舜的傳說，劉知幾率先以今情度古事。「疑古」篇說：

「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乃反正，若啓之誅益，亦由晉之殺玄乎？」^⑤

不僅對古史傳說有所懷疑，劉知幾對經書所載，也不甚相信，前引武王伐紂條即其一例，更進一步，《史通》乃敢於質疑孔子作《春秋》的體例、書法，「惑經」篇說：

「自夫子之修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本國之弑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亦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矣。」^②

像這樣大膽批評孔孟者，在儒學具權威性之時代，真可說是「非聖無法」的了^③。

降至宋代，疑經風氣與疑古思想合而為一。其實「疑古」與「疑經」本不可分。因「經」之所記載即為「古」史「古」事。歐陽修對愈到後代古史越長也愈駁難就相當不滿。「帝王世次圖序」說：

「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悉詳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④

後來崔述便繼承了這個說法，其《補上古考信錄》云：

「大抵古人多貴精，後人多尚博，世益古則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則其採擇益難。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於黃帝。然猶刪其不雅馴者。近世以來所作《綱目前編》，《綱鑑捷錄》等書，乃始於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開闢之初盤古氏者，且並不雅馴者而亦載之。故曰，世益晚則其採擇益難也。」^⑤

崔述與歐陽修的說法，到古史辨運動時成為顧頡剛「層累造成說」的源頭活水，就指陳之史事而言，可說無何軒輊。

那麼，古史辨運動是否祇是又一次大規模的疑古活動？古史辨運動和歷代的疑古思想有什麼不同？尤

其像崔述那樣鉅構的疑古工程，古史辨運動是否僅爲拾其餘唾？在探討思想史的意義時，吾人不能忽略此一思想在當時學術氣候下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對當時時代的影響。當我們驚歎於崔述那樣鉅構的疑古成績單時，首先要考慮的是：崔述在乾嘉考據氣候下，乃係極少數的一個特例。換句話說，崔述從「考信於六藝」發展出來的疑古思想，在當時的考據風氣下，其引起的注意乃極微眇，甚至比他大三歲的章實齋，在提出「六經皆史」的主張時，彼此仍無緣識荆。這一方面是牽涉到疑古思想的「量」之多少，另一方面也牽涉到「質」的問題。在乾嘉的考據氛圍中，崔述個人所努力的成績，對整個學術環境的影響，可以說是相當微小的。這固然是「量」的問題。但是，如果古史辨運動祇是把疑古的「量」增加了，以及影響整個當時的學術界，這又有什麼新的意義呢？

那麼，古史辨運動的歷史意義到底是甚麼？

簡單地說，古史辨運動是疑古思想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亦即從量的增加到質的改變，使疑古思想以一個新的面貌出現，而有了異於往昔的意義。

所謂的質變，其實就是改變了遊戲規則(Rules of Game)。先秦諸子的疑古思想，大抵建立在政治的企圖上；而植根於儒學體系的疑古思想，亦不脫其經世的本質，並且也因爲目的往往影響及手段，心理事實(Psychological Truth)便常取代歷史事實(Historical Truth)。尤其儒學體系「考信於六藝」的疑古思想，是一種長久以來被普遍承認的遊戲規則，古史辨運動最大的意義即是打破了這個遊戲規則，不把經當經看，也不把諸子當諸子來看，而是一視同仁地把這些典籍當成史料，「六經」不再是「聖道王功」的代表，諸子書的地位和儒學經典比肩齊步，而無所謂高下。但是，如果僅僅祇是把經書和諸子書平等看待，